



21日,在医院里,母亲张玲玲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早早身上的造瘘袋,小早早自己在一边玩耍。本报记者 王茜茜 摄

两次济南三次北京 只为给女儿看病

21日下午6点多,到了吃晚饭的时候,张玲玲习惯性地把病床沿的帘子拉上,打开床头灯,让早早与其他人隔开。“不能让孩子看到别人吃饭,不然她就吵着要吃。”张玲玲说,由于营养跟不上,两岁的孩子现在才18斤。

早早的姨妈买糖回来了,早早一把接过,脸上也开始露出了笑容。刚拿到糖,早早便动着小嘴吃起来。

两岁的早早仍然是简单快乐的,她还不知道,为了治好她的病,爸爸妈妈已经将房子卖掉了。

去年正月十二日,早早因便秘被送进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,但是复杂的病症让医生无法确诊,张玲玲便带着早早来到了省城齐鲁医院,初步诊断为“巨结肠同源病”,但由于没有床位,他们又去了山大二院检查,但医生只是做了结肠手术,并建议到北京的大医院再去检查。

随后,早早一家又去了北京的医院,但治疗方法仍然是输营养液和灌肠。一年多来,他们去了两次济南,三次北京,花费了20多万医疗费。借遍了亲戚朋友,费用仍不够,张玲玲只能把房子卖掉,搬去和公公婆婆一起住。早早的父亲也因为孩子生病急需用钱,辞掉了之前工作,跑到工地干活,每天赚120块钱,以此来支付女儿的医药费。

本报记者 王茜茜

两岁女孩患怪病 肚大不能排便

隔一天就得灌肠,父母为治病卖房

本报滨州2月21日讯(本报记者 王茜茜 见习记者 陈晓丽) 刚过完两岁生日的滨州女孩早早,又一次住进了医院。去年1月份,早早被初步诊断患有罕见疾病“巨结肠同源病”,从此父母就带着她开始了漫漫求医路。经过两次手术,花费了20多万元,家里的房子也卖了,早早的病非但没有治好,肚子反而一天变得更大。

早早降生于滨州市一个普通工薪家庭,一家人欢欢喜喜地迎接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。然而,这样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很久,早早八个月大时,妈妈张玲玲就发现孩子不能正常排大便,也不能正常饮食。之后,家人带着早早从滨州到济南,从济南到北京,奔波了多家医院,但早早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。

21日下午5点10分,小早早做完灌肠后,安静地依偎在妈妈怀里。刚放到病床上,小早早便挥动着小手喊起来,“糖,糖。”“好,好,现在就让姨妈给你去买糖。”张玲玲安抚着早早说。“刚才做灌肠时,她喊着说疼不做,我们就哄她说去买糖吃,这才听话了些。”

听到姨妈出去买糖了,早早安静了下来。记者走上前跟早早说话,早早看了一眼却没有说话。“每次做完灌肠,她都会不开心,可能是太疼了,哭喊得也累了。”张玲玲微红着眼眶说。虽然每次灌肠时,早早都会大哭大闹,需要三四个人按住,但是每次结束后,她都会靠在妈妈怀里,眼泪汪汪地对医生说一句,“谢谢爷爷,我灌完了!”说到这里,张玲玲和早早

的奶奶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现在,早早每天只能靠营养液、流质食物补给身体,排便基本上靠每隔一天做一次灌肠,五六包的水注入到身体里,然后再排出来,普通人都难以承受,更不用说仅仅2岁的孩子。

而每天高达700元的住院费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。从早早生病到现在,已经花去了20多万元的治疗费用,张玲玲告诉记者,“我们的房子已经卖了,现在一家三口都住在婆婆家里。”

如果您愿意帮助早早早日康复,可以和早早的妈妈张玲玲联系:15898895119。也可以拨打本报热线电话96706,或者联系本报记者王茜茜:13696307597。

相关新闻

早早这个年,在医院里过的

今年的春节,早早一家是在医院过的。从今年1月初,刚刚出院半个多月的早早又因进食不畅被送进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。但是医生建议去北京的大医院治疗,张玲玲和丈夫便带着早早赶到北京,住了三天院,依然是输液和灌肠,为了节省医药费,张玲玲便又把早早带回了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。

从1月26日住进医院到现在,早早一天也没出去过,包括过年。“其实孩子都这样了,我们哪还有心思过年啊。”

这个年,对于早早一家来说,和往常并没有不同,早早还是每天输营养液,还是要灌肠。
 本报记者 王茜茜

为了一线希望 下周一去武汉

躺在病床上,早早手里不停地把玩着各种“玩具”:棉棒、注射器、胶带、纱布……张玲玲说,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,早早学会了許多健康孩子听都没听过的名词,比如灌肠,比如胃管,比如造瘘。张玲玲说,有时候她抱着孩子走在医院的路上,早早看到有人吊着胃管,她就会大哭大闹,“我不要吊胃管!”

输营养液、灌肠,早早的生活每天都在这样重复着,“孩子很受罪。”但前两天,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告诉张玲玲,他们帮早早联系了武汉的一家医院,可能对这个病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。

下周一也就是24日,张玲玲一家人计划带着早早去看看。“哪怕有一线希望呢,我们也会去抓住!”张玲玲看着女儿,早早正举着手里的糖要给她妈吃,早早笑,她也笑。

本报记者 王茜茜

签拒收红包协议,能起多大作用

我省曾有医院实行,但因协议书存放问题而暂停

“住院要与医院签不收和不送‘红包’协议书?”20日,国家卫计委消息称,自2014年5月1日起,开展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签署《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“红包”协议书》工作。“这能起多大作用?”消息一出引起了医院和患者的热议。

本报记者 李钢

对医生收红包问题,卫生部门早就出台过相关措施。2004年,全国卫生系统开展纠正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,严禁医务人员收受患者及其家属的“红包”和其他馈赠。2013年,国家卫计委制定了《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“九不准”》,不准收受患者“红包”,但红包问题依然难以杜绝。

21日,在齐鲁医院就诊的患者李景新听了这一政策后举例说,“就像让受贿的和行贿的签个协议,就能不腐败了吗?”采访中,不少人对其效果表示怀疑。在省城某大医院工作的侯

江毫不讳言,他说,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,但仍有患者向医生送东西。在他看来,医生收红包的问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,“这与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,也与优质医疗资源紧缺有一定关系。”

侯江说,“医生不收,有时候患者心里反而不放心。”因此,在他看来,通过医患之间签署不收和不送“红包”协议书,很难真正解决这一问题。

根据卫计委要求,二级以上医院必须开展此项协议,其他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。据了解,我省曾有医院进行过探索,积累了一定经验。

“医生与患者签不收和不送‘红包’协议书,我们医院曾实行

过。”20日,山大二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早在2004年,该院就公开承诺,拒收红包。但当时该院坚持了一年多,就没能再坚持下去。

该负责人解释,没能坚持下去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协议书的存放问题。根据国家病案管理的相关规定,这种协议书不是必须放在病案里,这就产生了协议书的保存问题。“一年那么多患者,协议书的量很大,坚持了一年多,当时协议书都堆着没地方放了,最后就停了下来。”

对此,国家卫计委做出了规定:医疗机构要将医患双方签署的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,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归档和保存等工作。

专家观点

协议是否有用 关键在监督落实

“当时签协议的时候,对医生还是有约束和警示作用的。”山大二院有关负责人说,通过签署公开承诺书、医患协议书等,该院在解决医生收红包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。

但也有医院管理者认为这种方式不能起到多大作用。“通过这种方式,还会增加不少成本。”一家医院的负责人说,尤其像一些大医院,住院量非常大,这样一年算下来纸张消耗还是不小的,“而且到底能起多大作用,还很难说。”

“签协议书,应该说只是个

形式。”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徐凌忠说,这种方式并不是治本之策,要治本还是要加强法制管理,增强医生的自律。但在徐凌忠看来,这种方式也不是“一无是处”,“随着整个社会反腐的不断推进,相信医疗系统的红包问题也会缓解。”

徐凌忠说,通过这种签署协议的方式,可以起到提醒警示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的作用,“但是要监督落实好,不能流于形式,能发挥多大作用,关键就看落实。”

本报记者 李钢